

我自己是回族，但我不会强调我们回族如何如何，我也不会站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立场上讲话。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应当站在全体国民即 13 亿的立场上来开展研究，应当看到我国各少数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与全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要看到各民族的长远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利益。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民族国家是利益共同体的政治单元，全体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面临其他国家在贸易、外交、领土方面的竞争。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看做一个整体，从他们整体的长远利益来考虑。中华民族内部每个民族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不可分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小群体利益，而是需要把它们汇总起来，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就像费先生说的那样，已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了。

○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极化，知识上的后现代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怀疑论的滥觞以及虚无主义立场产生很大影响。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建构国家认同的时候需要面对。在这种语境中，一种现实的国家主义如何成为可能呢？

● 首先，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个“国家”就是一个竞争的单元，这个国家的国民不管你属于哪个民族，实际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共同的利益是难以分割的。譬如近期希腊的债务危机，国家的财政体制崩溃了，货币贬值了，银行没钱了，希腊的所有国民（不管你是希腊族、土耳其族、马其顿族或任何其他族群）同样是利益受损者，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有人以为损害了国家和政府之后，自己各方面还能有保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不管是苏联的和平解体，还是南斯拉夫的暴力解体，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除了个别当权者之外，绝大多数普通各族民众都是受害者。这一点，我们的少数民族精英的头脑一定要清醒。

○ 谢谢马老师！

【网络文章】

维吾尔民族及其话语是如何炼成的

介绍林昂的《以笔抗争：维吾尔民族和民族利益的话语（1900-1949）》（Ondřej Klimeš. *Struggle by the Pen: The Uyghur Discourse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nterest, 1900-1949*. Leiden: Brill, 2015. 280 PP）.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IzMDY5MA==&mid=208141486&idx=1&sn=6d6f00d7c63753473d0be4a599208ae7&scene=5&srcid=KPseEWoM0Zm5XXIpvB2P#rd

励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博士生

维吾尔民族认同是如何产生的？制度论者比如奥梅江·普利查克（Omeljan Pritsak）和杜磊（Dru Gladney），声称是由两个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一是 1921 年新疆籍代表在苏维埃中亚城市塔什干（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一次会议上坚持恢复“维吾尔”作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的族称，二是 1934 年时任新疆地方领导人盛世才将“维吾尔民族”（Uyghur Nationality）这一概念从苏



联引进新疆的民族识别工作。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早在 1921 年前，现代维吾尔民族认同已经产生。如耿世民就坚持，伴随着十六世纪突厥语维吾尔移民和印欧语土著的融合以及塔里木盆地随之而来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语言上的统一，现代维吾尔民族实际上就产生了。又譬如，劳拉·纽柏（Laura Newby）认为，十八、十九世纪南疆人民已经有超越本地绿洲认同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甚至扩展到了天山以北和东疆。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质疑制度论的行列，之前他们之中却没有人出版一部详述近现代维吾尔认同产生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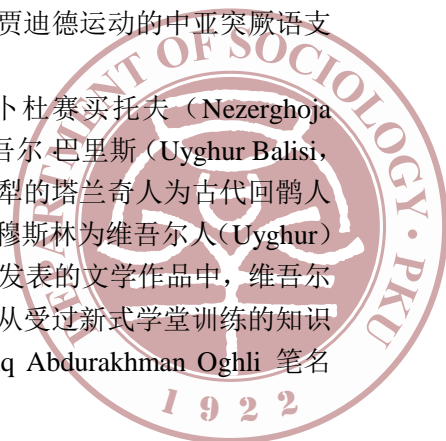
近日，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林昂（Ondřej Klimeš）出版的《以笔抗争：维吾尔民族和民族利益的话语（1900-1949）》帮助学术界填补了这一空白。林昂从活跃于 1900-1949 年间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入手，分析他们所写历史著作、小说、诗歌、回忆录、宣传册中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来还原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这些精英对民族利益定位的变化。

在本书第一章，简要回顾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以及阿古柏叛乱（1865-1877）后，林昂开始分析新疆近现代史上最重要历史学家毛拉·穆萨·赛拉米（Molla Musa Sayrami, 1836-1917）的两本经典著作：《安宁史》（拉丁维吾尔文：Tarikhi Amniyya）和《哈密德史》（拉丁维吾尔文：Tarikhi Hemidi）。通过对这两本著作的分析，林昂发现：19 世纪新疆突厥语穆斯林已经形成基于宗教的准民族共同体——穆索尔满（Musulman，维吾尔语中为“穆斯林”之意，笔者注）。“穆索尔满”具备形成民族的几个特质：群体边界、领土、民族起源、血缘神话、共同信仰、共同生活方式、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及群体认同感。这些特质在同治新疆回乱期间转化为当地突厥语穆斯林联合起来反抗清廷压迫的社群动员（Communal Mobilization）。在毛拉·穆萨·赛拉米笔下，此时维吾尔社会寻求的民族利益是在新疆推行良治（Effective Administration）以及保障当地突厥语穆斯林的福祉，支持阿古柏赶走腐败的清廷势力则是实现民族利益的表现形式。然而，清廷势力退出并没有保证这些民族利益得到实现。基于伊斯兰教的准民族认同，在异教的清廷势力退出新疆后，立马就失去了团结当地突厥语穆斯林的作用，新政权各种地方势力很快陷入内斗，露出腐败专制无能的嘴脸。出于对这些新贵劣政的厌恶，毛拉·穆萨·赛拉米笔下的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甚至期盼大清皇帝的军队能够尽快回来建立良治政府。

在第二章，林昂提出了几个促使准民族的“穆索尔满”认同向现代的“维吾尔”民族认同转变的外部因素：清末民初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及话语构建；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运动；沙俄突厥语穆斯林倡导现代化改革的贾迪德运动和试图构建现代突厥民族的泛突厥主义；苏联推动民族识别的肯定性行动。林昂认为，活跃在 20 世纪 10 年代-20 年代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通过在新式学堂学习、海外留学等途径，接触到了正流行于中国内地、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思想，促使他们超越伊斯兰教重新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

在书中，林昂援引大卫·布洛菲（David Brophy）的研究认为，把“维吾尔”（Uyghur）和新疆的“穆索尔满”（Musulman）联系起来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朱利安斯·海因里希·卡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1783-1835）和俄国哈萨克裔探险家乔罕·瓦里汉诺夫（Shoqan Shynghysuly Walikhanov, 1835-1865）。此二人指出古代的回鹘人（Uyghur）和南疆的突厥语穆斯林在基因、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直接联系。这种观点首先影响到了贾迪德运动的中亚突厥语支持者，接着在俄国中亚的新疆籍移民中流行开来。

林昂以常年旅居俄国/苏联的塔兰奇知识分子纳泽尔和佳·阿卜杜赛买托夫（Nezerghoja Abdusemetov, 1887-?）为例，认为光从阿卜杜赛买托夫的常用笔名维吾尔·巴里斯（Uyghur Balisi，维吾尔语意为“维吾尔孩子”，笔者注）就可以推断出，他已经视伊犁的塔兰奇人为古代回鹘人（Uyghur）后代，除此之外，阿卜杜赛买托夫还是第一位称南疆突厥语穆斯林为维吾尔人（Uyghur）的现代突厥语民族知识分子。在新疆本地知识分子 1910-1920 年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中，维吾尔（Uyghur）作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的族名也开始出现，这些文字可以从受过新式学堂训练的知识分子中找到。比如，阿布杜哈力克·阿卜杜拉赫曼·欧胡礼（Abdukhalik Abdurakhman Oghli 笔名



Abdukhalıq Uyghur, 1896 或 1901-1933) 的代表性诗歌《觉醒》以及买买提力 提吾皮克 (Memtili Tewpiq, 1901-?) 的《我们是维吾尔孩子》。

林昂认为, 活跃在 1910-1920 年代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与毛拉 穆萨 赛拉米不同, 他们的作品实现了从传统的宗教话语向现代民族话语的转变, 超越了基于宗教的准民族共同体, 而视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为民族 (拉丁维吾尔文: millet)。这批知识分子还进一步提出了“祖国” (英文: Homeland; 拉丁维吾尔文: yurt, el, ana diyar, ana yer, ana makan, weten) 的概念。这与民族-国家的叙事恰好实现了对接。尽管他们所引入的民族 (Nation) 和祖国 (Homeland) 概念将间接影响 1930 年代维吾尔社会精英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构建和实践, 不过林昂并不认为此时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视建立民族国家为主要的民族利益。

进入第三章, 亦即 1930 年代, 林昂认为有两件大事极大影响了彼时的新疆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构建: 一是 1930 年代初新疆穆斯林暴动孕育出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3-1934); 二是 1933 年盛世才上台并推行亲苏政策。如果说 1910-1920 年维吾尔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还是较为抽象的, 那么参与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则已经将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具体化并且付诸了实践。通过分析默罕默德·伊敏 (Muhammed Imin Bughra, 1901-1965) 的《东突厥斯坦史》 (拉丁维吾尔文: Sherqiy Türkistan Tarikhi)、艾敏·瓦希德 (Emin Wahidi) 的《革命回忆录》 (拉丁维吾尔文: Inqılab Khatirisi) 以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东突厥斯坦生活》 (拉丁维吾尔文: Sherqiy Türkistan Hayati)、《自由突厥斯坦》 (拉丁维吾尔文: Erkin Türkistan) 等, 林昂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已将“祖国” (拉丁维吾尔文: yurt, weten) 具体化为“东突厥斯坦” (拉丁维吾尔文: Sherqiy Türkistan), 只是他们所建构的民族并不是维吾尔民族 (Uyghur Nationality), 而是包括新疆各突厥语民族在内的东突厥斯坦民族 (拉丁维吾尔文: Sherqiy Türkistan milliti)。在处理与新疆之外突厥语民族的关系时, 这些知识分子会承认“东突厥斯坦民族”属于广义上的突厥民族 (拉丁维吾尔文: Türk millet)。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知识分子将寻求“独立”视作民族利益所在。盛世才政权治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则与这些参与叛乱的人不同, 他们对民族和民族利益的思考可以从盛世才当局支持的《新生活》杂志 (拉丁维吾尔文: Yengi Hayat) 中看出。这些知识分子受到苏联话语影响极深, 他们不认为新疆存在统一的“东突厥斯坦民族”, 而是存在着十四个民族 (英文: nationality; 拉丁维吾尔文: millet): 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柯尔克孜、蒙、塔兰奇、归化、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索伦、满, 他们共同构成“东突厥斯坦人民” (拉丁维吾尔文: Sherqiy Türkistan Khelqi)。当然, 维吾尔族 (英文: Uyghur Nationality; 拉丁维吾尔文: Uyghur milliti) 是其中最大的民族。需要指出的是, 《新生活》杂志中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只是地理名词, 与“新疆”是可以互换的。此时期, 《新生活》杂志中也出现了“新疆人” (拉丁维吾尔文: Xinjiangliq) 作为指称新疆居民的名词。在独立问题上, 与参与穆斯林叛乱的知识分子不同, 盛世才治下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承认新疆/东突厥斯坦是中国一部分, 他们希望实现在中国框架下的自治, 这也符合盛世才的利益。除了独立之外, 两个阵营对其他民族利益的定位基本一致, 比如他们都希望在新疆施行良治、现代化和代议制政府等。

第四章是本书主要内容的终章, 着重分析 1940 年代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正如 1930 年代一样, 1940 年代的新疆也曾存在着两个对立政权: 取代盛世才的国民党新疆地方政府以及受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政权。对立政权的存在方便了林昂继续按照两条路线分析两个阵营维吾尔知识分子在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构建中的异同。

通过检视《中国突厥斯坦之声》杂志 (拉丁维吾尔文: Chiniy Türkistan Awazi)、麦斯武德 (Mes'ud Sabiri) 的《演讲》 (拉丁维吾尔文: Bir Nutuq) 和《突厥的号召》 (拉丁维吾尔文: Türklik Orani)、默罕默德·伊敏 (Muhammed Imin Bughra) 的《用笔为祖国和民族而奋斗》 (拉丁维吾尔文: Yurt we Millet Heqqide Qelem Kürishi)、博拉特·卡地热 (Polat Qadiri) 的《自由口号》 (拉



丁维吾尔文: Erk Shoari) 和《省史》(拉丁维吾尔文: Ölke Tarikhi), 林昂发现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受到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 他们反对将新疆境内的突厥语民族进一步细分, 而是主张新疆境内所有突厥语民族归于一个民族: 突厥, 而突厥斯坦则是突厥民族的祖国。但与 1930 年代的“东突厥斯坦民族-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叙事不同, 1940 年代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并不谋求分裂新疆, 他们的“突厥-突厥斯坦”话语体现的是文化上的意义, 他们希望在国民党当局的中华民族话语建构中为本民族求得一席之地, 确保自己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而与汉族有同等的政治和文化权利, 并将争取地方自治视为本民族利益所在。和国民党阵营中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不同, 苏联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三区革命维吾尔知识分子则完全不理睬泛突厥主义话语, 而是沿用盛世才的民族话语, 自认为是维吾尔族(Uyghur nationality), 与哈萨克族、塔兰奇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等一起构成了东突厥斯坦/新疆人民(Sherqiy Türkistan/Xinjiang Khelqi)。在民族利益的定位上, 虽然起初他们希望建立独立国家, 但随着与国民党政府和谈的进行, 他们放弃了独立诉求, 转而寻求在新疆建立自治政府。由于 1949 年国民党势力退出新疆, 三区革命维吾尔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重用, 他们的民族话语实际上在建国后的新疆占据了主导地位。

作为一部历史学著作, 林昂在这本书显露的史料功底是颇为扎实的, 他充分利用了维吾尔和汉文相关一手资料, 也全面参考了既有的英文学术成果, 使本书不失为现代新疆研究中的高水平著作。此外, 林昂对维吾尔知识分子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的检视, 也使读者对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有新的了解: 现代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并不是单线发展的, 而是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径。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构建的是统一新疆各突厥语民族的东突厥斯坦民族或者突厥民族, 而亲苏维吾尔知识分子构建的是单一维吾尔民族。之所以后者主导了建国后新疆的民族话语, 是因为支持三区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支持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国民党政权。在对待统一/分裂的议题上, 无论是泛突厥主义维吾尔知识分子或亲苏维吾尔知识分子都无一以贯之的立场, 是否支持统一/分裂, 往往受限于当时当地的地缘政治环境。

本书堪称近年现代新疆研究领域中的上乘之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进一步商量的空间。比如, 林昂肯定了苏联民族政策影响的同时, 还认为盛世才在新疆识别出十四个民族是为了达到“以夷制夷”, 但林昂并没有比较两个因素的权重。然而对盛世才民族识别后新疆人口估计显示, 维吾尔族占了 77.75%, 第二大突厥语民族哈萨克族占了 8.55%, 其他几个突厥语民族加起来在 5% 左右。可见维吾尔族在民族识别后确保了绝对优势, 那么“以夷制夷”的效果显然不会太明显, 因此笔者认为盛世才在新疆进行民族识别, 受苏联民族政策影响应大过“以夷制夷”的考量。此外, 本书尚留有一个重要问题未解决: 知识分子的民族和民族利益话语是如何传递给普通民众的? 林昂虽然在书中给出了一些暗示, 比如发行刊物等。但民国时期新疆突厥语穆斯林识字率恐怕并不高, 通过发行刊物传播自己的思想, 效果未必会佳。我想这将是留待作者本人或其他现代新疆历史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